

常态人生下官员的进退沉浮^①

——评肖仁福的机关小说创作

龙长吟

(湖南省作家协会,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肖仁福的小说创作聚焦机关, 正面表现各级官员如何当官, 书写他们在常态人生下的人生进退和命运沉浮。他以平常心看待机关和官员, 其作品扬弃了清官与贪官、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模式, 真实表现了当代官场作派和官场潜规则。

关键词:肖仁福; 机关小说; 常态人生; 官员沉浮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005-05

The Ups and Downs of Normal Life for Officials

——On the Authority Fiction Creation by XIAO Renfu

LONG Changyin

(Hunan Provincial Writers Association, Changsha 410003)

Abstract: XIAO Renfu's novels focused on the institutions. His novels expressed the officials how to be an official at all levels in the positive angle and revealed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ir normal life. He used to judge officials from the normal way and his works abandoned the opposite mode of corruption and honest or upright official, and good guys or bad guys, with which demonstrated the true performance of contemporary officialdom and the official unwritten rules.

Key words: Xiao Renfu; authority fiction; normal life; ups and downs for officials

肖仁福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 以《官运》崛起于文坛, 其后更有《位置》和3卷本长篇《仕途》等畅销小说面世。在肖仁福的6部长篇小说中, 《官运》写“官”, 《位置》写“吏”, 《仕途》写“僚”, 《心腹》写“仆”, 《待遇》写“退”, 《意图》写官民之争, 另有《局长红人》《脸色》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他的叙事目标全都指向机关, 正面表现各级官员在社会常态下的人生进退和命运沉浮, 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肖仁福与张平、王跃文、陆天明、周梅森等一起, 被誉为“当代官场文学五虎将”, 加上李佩甫, 合称“当代官场小说六大家”。就气象而论, 肖仁福直面机关, 其小说温厚敦实, 后来居上,

是当今专事机关小说创作的专门作家, 又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判定为“21世纪中国机关小说第一人”。

肖仁福惯于用平常心看机关和机关里的官员, 这也是他机关小说创作的基点。机关, 官场的别称, 即掌权阶级的办事机构或官员的办公场所, 旧时称衙门, 它是一个中性词。作为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的机构和机构所在地, 它只是一种职场, 是官员活动的一个平台, 职场无疑也是中性的, 并无光明与黑暗之别。肖仁福从不仰视官员。他认为, 仰视会高化对象, 矮化自己; 俯视会矮化对象, 高化自己, 都会使生活严重变形。用平视的眼光看官场才

^① 收稿日期: 2010-09-22

作者简介: 龙长吟(1944-), 男, 湖南邵东人, 湖南省作家协会研究员,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能抵达真实。不过,今天的官员毕竟与从前的南下干部和工农干部一类官场主角不同,这批官员有文化,见多识广,观念开放,雄心勃勃。而时下的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农耕文化尚在向工业文明转型,信息时代已倏然而至,因此时下官员在为官处事上必然表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一味写官场阴暗,将官员妖魔化,以为官场只有腐败,不对;将官场写得十分神圣、庄严,忽视了其中非理性因素,也不妥。中国官场小说家对官员,历来是有成见的。我国现代官场小说的发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极尽讽刺之能事,一开始就表现出作者对官场的极端不满。对此,连鲁迅也不甚赞同,批评其中臆想成分太多;胡适评价说写大官不像,夸张讽刺失于分寸,写小吏神情毕现。这原本就是庙堂知识分子与在野知识分子普遍矛盾的反映。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小瞧了它们的社会认知功能和文体解放的作用。

正确看待人的欲望,这是肖仁福机关小说的写作前提。欲望,正常人都有,人人都追求生存的惬意。恩格斯把人的欲望追求统称为恶,但这个恶,却是社会发展的杠杆和动力。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欲望的别称)分为五大类型,一一肯定。可以说人在某种程度上即欲望的化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曾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他人有关的事情。”^[1]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刺激欲望,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国策。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对待欲望的态度大体分为禁与纵两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早已被唾弃,但纵欲主义主张无休止地行乐,也不科学。对于欲望的放纵与收殓,关键是把握对象,分清场合,掌握分寸。肖仁福说:“我能做的是从人性角度,将行走于官场内外的芸芸众生行诸笔下,真实且充分地展现他们的欲求。欲望既然是行动的原动力,欲求本身没有一点错。权欲的存在,让人乐于管理公共事务;物欲的存在,让人乐于生产物质财富;性欲的存在,让人得尝爱情美果,让生命生生不息。”^[2]这样处理作品中人物的行止,是他机关小说成功的基础。

肖仁福虽也向往“好官主义”,但基于对官员的人性表达,他的机关小说扬弃了清官与贪官、好人

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长期以来的专制政治体制,人们把国富民强的希望都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痛恨暴君、奸臣、贪官,期望忠臣、清官出世。圣君廉官秉政,世道清平,国人由此形成了“包丞相与陈世美(贪恋荣华富贵)”、“秦桧与岳飞”、“于成龙与何绅”(贪财)一类忠与奸、廉与贪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也决定了近20年来官场小说的基本构形是贪官与清官、好人与坏人、腐败与反腐败的对立。商品经济时代,生存的物质条件极大优化,各种欲望的诱惑,竞争的加剧带来精神情绪的紧张,人都变得复杂、多面,有时连自己都难以把握自己了。而且,市场经济形态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也相应发生变化。无论是现实中或仿现实的小说里,一个官员,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就能概括得了,更不能用忠、奸、廉、贪中的一个字盖棺定论。清官与贪官、好人与坏人,有为与腐败有时同在一个人的身上先后出现。这种以道德评价为基准的二元对立构形在肖仁福小说中彻底解体了,他以情商和智商为参照的“适当与失当”的行为评判,作为自己小说新的裁决方式和裁决标准。肖仁福特别推崇亚当·斯密的行为适当论,认为官员的行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只有适当与不适当之别,把握好行为的适当性,离成功便不再遥远;否则只能出局。《仕途》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乔不群和蔡润身,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府官员,都在不停地谋权和用权。所不同的是,乔不群谋权用权行为比较适当,最后获得成功,包括职位的升迁和人格的完善;蔡润身谋权用权行为失当,虽到了高位,也出过一定政绩,最后却身败名裂,人格也严重扭曲。这就写出了真实复杂的机关人生。

正面描写知识分子如何当官,是肖仁福机关小说的写作重心和优势。作者长期在教育、财政、政府、党群等党政部门工作,很多机关人事、官场潜规则烂熟于心,为他的机关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肖仁福总是直面机关,把每一个官员直接摆进他所在的职场中,正面展开一个官员的生命之旅,正面描写他们如何处理中心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各种人事矛盾、实际问题,如何在上级、下级、朋友、同僚之间周旋,在对官员日常的“为官”、“为人”、“为事”作综合叙事中展现官员的人生际遇和人情世态,事事与官员自身的升降沉浮、进退得失紧密相连。机关的显性标志是位置,人在机关,位置特别

重要。做官,就是谋位、谋权、谋事。“位置”实际上就是无形权力的物化形式,作者说:“位置就是权力,人在机关或说官场,不追求位置又追求什么呢?官场中人追求位置没有罪过,天经地义……位置有大有小,有好有差,做上科长,肯定会盯住处长位置,做到处长,自然要盯住局长位置……官场人格就是力争上游,找个理想的好位置,位置太低太差,到了位置比你高的人面前,你的人格都会打折。”^[3]他的第3部长篇,书名就叫“位置”,小说通过那个有形的物化的位置,展开对无形权力的叙述和剖析。官场的要害和核心是权力。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人与人之间支配关系的确立与运用,大而言之有政权,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专政,一个政治集团对另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小而言之,只要有两个人出现的场合,就存在着一个谁支配谁,谁听谁的话的问题,这就是权力。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官场是权力最为集中,权力效应发挥最充分的地方。权力一被剥夺,官就不是官了。官场就是权力场,“官”就是位置加权力,为官的要务就是谋权和用权。“一切权力归农会”时,村农协主席也是重要的官;“大权旁落”后,皇帝也受制于权臣。有了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按照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实际状况,权力不只是压迫和控制,它还有造就、生产、创造、改变等更多更丰富的含义:权力可以造就人才、生产知识,创造财富和好的局面,改变旧的不良的陋习等等。写机关的小说,不写官员的谋权用权,不写权力活动或权力斗争,不写官员利用权力办事造福,就不是真正的机关小说。肖仁福被誉为“21世纪中国机关小说第一人”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写透了人家没有写或写不出又必须写的机关生活的要害与核心。他的《仕途》以乔不群的仕途人生为主线,以办事作重心,展现了知识分子当官的种种欢乐、幸福、满足、尴尬、苦恼和不平。乔不群原是桃林市政府研究室综合处处长,因不合时宜的玩笑得罪市长,远离领导和权力核心,发配边缘处室,可他却利用这一别人看来无所作为的平台,重新进入领导视线,持续进步,成为政府办纪检组长、政府办副主任、政府秘书长、副市长,直至代理市长,慢慢地有了权,有了大权,于公于私,都干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实事,可以说乔不群是知识分子入仕从政的成功典型。也正因为权力的作用力太大,自身控制不了权力,官场的变数实在非人力能够定局。在挑战与希望同在、变数与

机遇并存的官场生涯里,乔不群几经起落浮沉,虽然抵达仕途人生应有的高度,但终因与“上访专业户”有染,在鼎盛之时被永远定格。成熟了的他尽管也追求着人格的逐步完美,转向佛教寻求精神的寄托,但内心毕竟有几分无可言说的无力回天的遗憾与无奈。长篇小说之外的中篇小说,《裸体工资》和《空转》里的何铁夫,《支教》里的陈东,《背景》里的秦时月,《一票否决》里的周正泉,《闲人》里的孟不觉,主人公都是处于权力核心或围绕在权力周围的机关人物。他们的人生旅程随权力的大小、得失而起伏沉浮,他们在权力得失面前五味杂陈的生命体验,不能不令人心动神移。长篇小说《待遇》,虽然不再以谋权和用权为主要叙述对象,却是写主人公冯国富离开权力领域后所看到的人情世态和他原本拥有的真实自我,仍然没有离开一个权字。那种权力失落后的人生况味,虽然有些猥琐,却是非过来人难以理解到位的。

作者之所以能如此合情合理、实实在在的重笔调写官员的仕途命运,关键是他能大胆地肯定知识分子当官的人生选择。知识者在对待自身阶层人士当官的问题上往往难以采取正确的态度:好多知识分子“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以清高自居,藐视官员,不得已时又去依傍官员。杜甫之于严武等古人不说,近现代杨度依傍袁世凯,章太炎晚年“伴黑”,为杜月笙撰写家谱,康有为1000元大洋给吴佩孚写50大寿贺联,无不显示其双重人格。少数知识分子认为读书人应当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肯定当官的人生选择,但对儒家的“入世”思想采取了不适当的仰视态度;还有知识者像一般民众那样,羡慕当官者大权在握,富贵双全,美女相伴,恨自己命运不济。肖仁福没有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心态。他不是站在儒家权力崇拜和官本位的立场,而是站在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立场上,客观地审视官员这一特定职业,承认当官是大化人生,实现个人价值的最有效的方式,显得比较理性。

表现官场作派和官场潜规则,这关乎肖仁福机关小说的气韵。每个机关小说家都注意到了写官场作派和官场潜规则,但在表现的真假、粗细与体验的深浅上大有差别。官场潜规则是只在官场适用,官场中人违反它则将惹大祸的细节规矩;而且它只能做,不能说,便带有几分玄妙色彩而成为“官场真经”。肖仁福笔下的官场潜规则,都击向要害,射中点子,表现得深入而细腻。官场格外忌讳在官

言官,说话办事特别讲究含蓄。剑拔弩张、直言不讳,是官场的大忌。官场中人说话惯绕弯子,话里若夹着“还”字什么的,意思却变得意味深长。至于官场之中的工作关系纯属正常关系,正常关系不同于特殊关系,基本相当于没关系。官场上的优势并不是工作能力,也不完全是学历和年轻,而是腰要软,该弯的时候弯得下去。这些潜规则或作派,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什么酒要满斟茶不能倒满呀,什么秘书给领导开车门不能从车头绕过去呀,等等,因为细,似乎不太重要,殊不知,弄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处境和升降。这无数的官场真经与官场人事合起来就等于官场百科全书了。《仕途》中桃林市为办桃花节招商引资,市委书记亲自带领市委、政府一班人马现场劳动,还要拍电视,可是市委书记裤裆扣子未扣。为了维护领导形象,又不伤大雅,必须提醒书记扣好裤裆。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秘书等在场所有官员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发挥了可能发挥的最高智慧,本来半句话可解决的事,费了近半个小时口舌,通过种种暗示,才让书记领悟。这就是官场规矩!悲剧、闹剧,还是喜剧?前后长达数千字的叙述,读来令人发笑,更令人心头发沉。《仕途》篇幅宏大,线索繁复,是当下官场的百科全书,也是社会百科全书。除了军事方面外,其余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战线,意识形态上的文史哲经教各领域,人的意识潜意识里的各部分,方方面面都写到了。书中还写到不少平常段子、玩笑之语,那些也是人情世故的高度概括与形象表达,它们是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产物。检举箱中的检举信早在八年之前投进去的,原封未动,是八年了举报箱没人开过,还是开箱人对举报信不感兴趣,从没动过,更不愿拿走?这都无关紧要了。紧要的是事情本身太触目惊心。另外,肖仁福小说的笑料,浑而不黄,夸张而不失真,诙谐而不邪僻。真乃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常态中的变态,内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

肖仁福不是只写官,不写“民”,他机关小说中的“官”与“民”是相互依存的。不写民,则无从表现官。肖仁福善于从官民关系中写官写社会。长篇小说《意图》,从一个小小幼儿园的改制入手,通过以园长卓小梅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与以市委书记魏德正为代表的强势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民与官,弱与强,小与大,贫与富几股力量的抗衡。结

果是,卓小梅“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凸显了当代社会下草根阶层的生存困境。肖仁福所做的就是通过对这几股力量的叙述,给读者呈现一幅复杂的世态图,供人思考。但在小说的最后,卓小梅的儿子亲热地喊了一声“妈妈”,给卓小梅和读者一丝暖意,这是作家的慈悲情怀,想让这声妈妈唤回人们心底的希望。《意图》的出版,使肖仁福赢得了中国良知作家的美誉。

肖仁福的机关小说不造作,不靠掀天巨浪,人为地激化矛盾来生成魅力,也不靠机巧,不靠特殊的片段、奇人异事做文章。当今有的官场小说剑走偏锋,惊世骇俗,又讨巧,又卖乖,也省事,但就厚重而论,却输于正面描写社会、人生、历史和机关的种种小说了。肖仁福宁愿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写人,表现官员的常态人生,不愿意写异态和变态人生,这为他的小说创作增加了不小难度。常态人生大家都熟悉,作不得伪,来不得虚。写作常态人生是做扎实事,做扎实事要扎实功夫,靠的是实力耐力和韧劲,还要好的体力;但写常态更接近生活的本相。平常是真,平淡是真,真实是艺术的命脉,把握住这一命脉,才能从平常里发掘不平常,从平淡里酝酿出浓郁。肖仁福作品中“一种不同于整个时代浮躁氛围的从容和淡泊”,“颇使人感到了一份沉静、悠闲和安宁”,^[4]流露出淡雅和悠扬,呈现出含蓄洗炼,冲淡沉着的官场小说的特有风采。

肖仁福的小说叙述率性但不张扬,表达自由、充分,不是酣畅淋漓的那种,而是让人舒筋活络、心情舒畅那种。他的作品虽也偶有闲笔发点感慨,却很难看到耳提面命的教诲与评论,完全是恩格斯所要求的作家的情感和倾向隐藏在具体的情节与场面之中。受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的影响,肖仁福小说的语言如“无心常入俗,悟道不留痕”一类,凝炼含蓄,有灵气。他把笔记小说立意新颖、表达机巧、充满智慧的精神旨趣与现代小说的幽默讽刺融为一炉。讽刺,在他的小说中占有很高的比重。这是因为,官场上许多事情总是超乎常人想象的,如实地写出来,就成了讽刺。肖仁福机关小说的讽刺,得了鲁迅、林语堂等五四作家的真传。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污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

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5]在长篇小说《仕途》中,市里要办桃花文化节,可当年偏偏出了倒春寒,桃树开不了花,只好人为地给桃树们御寒升温,给桃树绑上棉衣棉被,就像人穿衣服盖棉被能保暖一样;还把火盆火钵端到桃树下,烧上木炭柴火,直接给桃树御寒升温。可是,桃树们裹了棉,缠了布,烤了火,却依然无动于衷,毫无反响,看不出有立刻开苞发花的意思。于是他们从蔬菜水果,鸡鸭鱼猪牛羊,打上激素成熟就快,投入产出周期大大缩短的经验得到启发,赶快给桃树注射激素。一时间,安排人进医院,上药店,广征博采,大量收集激素,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无需再着一字,其极“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之处暴露无遗。

近20年来我国官场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作家云集、作品林立、长盛不衰、日益走红的创作局面。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官场文化超级发达的地方,官场集中了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更是各色精英人物粉墨登场集体表演的大舞台。人进入了官场,就进入了社会核心,通过这个核心,便有可能更准确地观照中国社会,洞悉世道人心。官场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存状态,官场小说因此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当代文坛涌现了许多优秀官场小说家和小说精品。张平善于在腐败与反腐败的风口浪尖上歌颂英雄,鞭笞丑恶,小说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动人心魄的正义感;王跃文的小説善于从世俗眼光中反射官场的生活动又不失文化品位,生活气息与文学韵味都很浓;陆天明总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书写官民之争,厚重之中洋溢着良知与善意;李佩甫一部《羊的门》写透了中国现代官场以人划线,以人治代法治的表面热闹、内里荒唐的凄凉内幕;周梅森通过“能主沉浮”的大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所作所为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让人物面孔在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评判中生气勃勃;肖仁福则在为官、为人、为事的综合叙述中,正面书写官员常态人生,展现当今人生百态和万千世相。在他们的带动下,时至今日,官场小说更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有登堂入衙,从高层写官场的;有打着瞍瞍眼,从后院或者从办事处的窗口写官场的;有激情澎湃反腐倡廉的,有微言大

义曲笔讽政的,有左顾右盼维护我党形象的;有直述官运沉浮,或曰造化弄人,或曰潜规则害人,或曰刚正不阿难为官,或曰高官贵胄必有人生大智慧等种种不一。反腐倡廉的基本主题,上层生活的揭秘,官权钱色的世俗气息与高贵尊严的表相构成的反差,官场作派与机变权谋的生存智慧,应有尽有。官场小说越多,读者的胃口也越高。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反腐倡廉这类虽然是常说常新、却已耳朵起茧的一般描述,也不再迷恋那些酒色财气、荣华富贵等世俗享乐生活的渲染,更是反感那些类似于黑幕小说的人身攻击。人们希望从官场小说中看到更多更广更深刻厚重的东西,或者看到此前官场小说未曾涉及的生活领域与层面。纵观今日所有官场文化小说的主流,它依然是“反腐败”居多。但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说到了点子上:“各种政体的腐化几乎总是与原则的腐化开始的。”^[6]这一思想,官场小说家很难直接表现。写严重了,出版不了;写不到位,读者不认同。官场小说想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在人物刻画上避免走向模式化、平面化,立足于生活,将权力对心灵的挤压等人性的真实和官场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让读者能够由此而意识到症结所在。正在这个关口处,肖仁福的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1-102.
- [2] 肖仁福.领导也是人[M]//仕途:卷1.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351.
- [3] 聂茂,肖仁福.民间立场的书写理由[J].芙蓉,2007(3).
- [4] 金立群.评肖仁福的《人有三老》[J].文学教育,2007(2).
- [5] 鲁迅.什么是“讽刺”[M]//鲁迅著作全编:第2卷.林非.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68.
- [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7.

责任编辑:黄声波